

二 十 一 世 纪

中国文学大系

E R S H I Y I S H I J I
Z H O N G G U O W E N X U E D A X I

2001—2010

总主编 何言宏

随 笔 卷

本卷主编 王彬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二 十 一 世 纪

中国文学大系

2001—2010

总主编 何言宏

随 笔 卷

本卷主编 王彬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随笔卷/
王彬彬主编.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651-1661-2

I. ①二… II. ①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②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3095 号

书 名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随笔卷
本卷主编	王彬彬
责任编辑	万 斌 李舜卿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919(总编办)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http://www.njnup.com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6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字 数	378 千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1-1661-2
定 价	58.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E R S H I Y I S H I J I
Z H O N G G U O W E N X U E D A X I

顾 问

丁 帆 陈思和 林建法 洪子诚

总主编

何言宏

总策划

何言宏

策 划

丁亚芳 王政红 王欲祥

编委会成员

丁亚芳 丁晓原 王 尧 王光东 王政红

王家新 王彬彬 王欲祥 吕效平 何言宏

张学昕 张清华 张新颖 陈晓明 施战军

徐 蕾 黄发有 彭志斌

（以姓氏笔画为序）

前言

何言宏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凡十三卷十八册，经过各位同仁的共同努力，终于面世，无疑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文学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首先表现于它的世界性的历史处境。2001年发生于美国的“9·11事件”对于世界格局的改变，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还是在精神、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都非常巨大。也就是在这一年，中国经过艰苦的努力与谈判，终于加入了“WTO”。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经济的影响自不待言，其对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实际上也非常深刻。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就发生和发展于这样的世界背景，并且和这样的背景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内在联系。

在中国内部，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对于世界体系的进一步融入和改革开放在多方面的拓展与深化，市场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初步形成，媒介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与发达，文学体制包容性的扩大和评奖制度的调整，以及中国台湾开始于上世纪末的政治转型，香港和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对祖国的回归，都不仅使中国各个区域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生了变化，它们之间的文学与文化关系，也与此前大为不同。这些“变化”和这些“不同”，二十一世纪以来表现得尤为迅猛、尤为突出，文学处身其中，无论是主动被动，还是直接与间接，自然与它们深切关联。在这些关联中，我们关注最多和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的文学——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的作家、诗人，我们的文学批评家、文学研究者，和我们的文学翻译家、文学编辑与文学出版工作者等等——都力图以他们的劳作去书写、把握、追问、反思与介入我们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广大民众的精神与生存，在我们的文学中得到了异常丰富的

表现。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潮流迭起、异彩纷呈，老一辈作家坚守良知，佳作不断；中年作家们勇猛精进，成就卓绝，殊为我们文学时代的中流砥柱；青年一代，也都姿态各异，身手非凡。二十一世纪以来，我们出现了那么多非常杰出的作品。我们的文学在精神特征、话语表达，在价值、美学和艺术策略上既有坚持，又有新变，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和相对独特的文学时代。这个时代虽仍在进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未来必定宏阔，必有大成。因此，为了全面、系统和较为及时地总结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国文学，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基本格局和重要史料进行认真切实的梳理，并且遴选出其中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一方面为后人对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进一步研究和文学史编撰提供最具权威性的经典文献，另一方面，也为社会各界和广大读者提供一套权威性、系统性和集成性的大型选本，我们特邀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界的著名学者和著名批评家编选了《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

我们的“大系”，充分借鉴和学习了赵家璧先生1935—1936年间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来各辑“大系”的历史经验，也据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既有常规性的“理论批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文学”、“杂文”、“报告文学”和“史料”诸卷，也专门设立了“翻译文学”和“随笔”卷，在文学史的意义上强调和突出“翻译文学”对于汉语文学的重要意义，也反映了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笔”文体的持续兴盛。我们希望，我们的“大系”在学术精神上既能对前辈有所承传，也能具有新的尝试和新的开辟。

《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虽然较早地动议于2009年，并在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启动，纳入了江苏省“十二五”期间的重点出版规划，也获得了我们学术前辈的热情鼓励与肯定，但是，为了保证编选工作的客观性与严肃性，为了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所必须具有的时间的沉淀，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

国文学结束几年后方始推出。各卷主编作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与文学批评界都极活跃与非常著名的学者与批评家，工作繁忙，而能戮力同心地沉潜数年，共襄盛举，真的应该深深感谢。昔者赵家璧先生在其《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前言”中曾经说过：“我们相信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间许多英雄们打平天下的伟绩，是值得有这样一部书，替他们留一个纪念的。现在我们做成了，我们觉得了却了一件心愿！”对于我们这套“大系”来说，值得纪念的，除了我们的很多作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们的文学“伟绩”，还有我们的前辈与我们的同仁们对“大系”所付出的很多热情、很多心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也非常想说：“现在我们做成了，我们觉得了却了一件心愿！”我们希望，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文学必将取得新的“伟绩”，我们的文学研究界与批评界，也必将有一次新的集结。

出版说明

本套《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1—2010）》自2010年开始策划，至今已四年有余。从组稿到选编，从定稿到编辑，几经斟酌、打磨，这套丛书终于面世了。

作为丛书的策划与出版者，我们的心中并不觉得轻松。众所周知，选编新文学大系的做法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赵家璧先生，其后上海文艺出版社又陆续出了二、三、四、五辑。新世纪以来，虽然也不断有各类文学选本陆续推出，但以头十年为考察时间段的综合性大系类丛书，这还是第一套。十年，还不足以呈现文学思潮发展的清晰脉络，但经过十年的淘洗沉淀，新世纪文学创作的趋势和特点已经逐渐在我们面前展开，渐见分明。选编本套大系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踵武前贤而又不失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特点。经过与总主编及各卷主编多次的商讨，在借鉴前五辑大系框架结构的基础上，我们选定了十三个种类，分别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翻译文学、报告文学、诗歌、散文、随笔、杂文、戏剧、理论、史料、批评，并为各卷配上了分卷主编所撰写的导言，对相关文学体裁这十年来的发展踪迹做了较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供读者参考。

与前五辑相比，本套丛书既沿袭了传统的文学分类又有所创新，如将散文、随笔和杂文分册选编，显示了“随笔”这一文体近年来独具特色的面貌；又如将翻译文学独立成卷，凸显“翻译”这一特殊创作形式对于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与中国文学逐步融入世界文学的步调也是相应的。当然，限于精力和客观条件，我们舍弃了一些同样具有鲜明文学特色的体裁，如小小说、儿童文学、影视文学等。

大系是一种特殊的读本，也是一种特殊的史料集，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以存真、求善为原则，订立了以下编校原则：

一、关于选目

突出名作名家，兼顾风格流派。

二、关于版本

1. 原则上以最初发表的版本为准。

2. 少量的以作者认可的定本为准。

三、关于编排顺序

全套丛书多依文章发表的先后为序，少数按照分卷主编选编的类型排序，如戏剧卷以主题分类、诗歌卷以作者姓氏排序。

四、关于注释

1. 全书不加注释，只在每篇篇末注明选文出处或版别，如原载《×××》×年第×期，或选自××出版社×年第×版。

2. 原书少量典实确实有误，也不改动，但加脚注予以指出。

五、关于编校

所选篇目文字以初版为据；少量以作者定稿本为据的，加注说明。

1. 错别字径改。但异形字或异形词，或者过去的习惯用法如其它一其他、精炼一精练等，原文如用前一项的均不改。

2. 标点依据目前较规范的用法，对明显的错用加以改动，但不强求统一。

3. 年代、数字、称谓的用法也一依原作，不作统一。

文学大系的选编既是一家之见，难免会存在争议。但我们相信，争议也正是编辑这套丛书的意义之一。由于经验和水平，我们的编校中难免还存在失误和错谬，希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以使我们的工作更臻完善。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7月23日

导言：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表达

——十年随笔挹滴（2001—2010）

王彬彬

—

要了解最近几十年中国的思想状况，决不能只注意那类高头讲章，决不能只注意那些学术论文和学术专著，数量众多的被认为是随笔的文章，也是不可忽视的。我甚至想说，随笔，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思想表达的最重要的方式。

但要给随笔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却又是难的。随笔与论文的区别如何界定？随笔与通常所说的杂文又有何不同？随笔一般认为属于大散文之一种，但在人们心目中，它与通常意义上的散文还是有差别，但这差别又在哪里？——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易说清道明的。多年前，一家面对中学生的刊物命我写一则短文，对随笔这种文体做出解释。我当时是这样写的：

“随笔”这名称古已有之。《文心雕龙·总术》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所以，“笔”在古代指无韵文，它的范围极其广泛，包括韵文之外的所有文章和文字记载的东西。宋代以后，举凡见闻杂录、读书笔记、资料考证等等，都称作“随笔”。

在今天，“随笔”是“散文”之一种。顾名思义，“随笔”就是随兴而谈之“笔”。所以，“随笔”是一种相对自由的文体。作者借助“随笔”这种文体，可以比较不受拘束地发表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所谓

“不受拘束”，指作者不一定要对所谈论的问题有十分周全的思考，不一定要在谈论对象时面面俱到。如果作者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确有自己的感受和认识，就不妨以“随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认识。但这又并不意味着“随笔”就享有以偏概全的“特权”。“随笔”可以只发表对问题的某一方面的见解，但却应避免把对某一侧面的看法上升到对整个问题的看法。换句话说，“随笔”可以专就白璧上的微瑕做文章，但却不应把微瑕放大到掩盖整块白璧的程度。

“随笔”当然也可以抒情。但与抒情相比，“随笔”更宜于说理。“随笔”通常用来表达作者对某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一篇好的“随笔”，应该能为读者提供某种独特的思想，这思想可以不成系统，可以思及一点而不及其余，但却应该力求清新、深切。用习惯的说法，“思想性”是“随笔”的本质属性。好的“随笔”应该能益人神智，应该能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

作为“散文”之一种，“随笔”对作者的学识有比较高的要求。“随笔”作者应该是一个勤于思考并善于思考的人，同时，又应该是一个尽可能具有广博学识的人，一个极可能具有学者素质的人。“随笔”作为一种思想者的文体，它要求作者不人云亦云，始终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但冥思苦想而束书不观，必然流于胡思乱想。所以，勤学而敏思，是写好“随笔”的前提。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随笔”，还应该具有起码的文学性。首先是“随笔”的语言应该是富有文学意味的。在结构上，也应该表现出一种“苦心经营”的“随便”。“随笔”要具有文学性，还应该不仅仅满足于说理，同时还应表现出一种“理趣”。

以上是我多年前对随笔这种文体的看法。我对随笔的基本看法仍然如此。随笔最突出的特性是思想表达的相对自由。这种自由首先是针对严谨规范的学术论文而言的。如果借用战争术语来说明学术论文、随笔和杂文的特性，那么，学术论文是阵地战，随笔是运动战，而杂文则不妨说是游

击战。杂文某种意义上比随笔更自由，但却不能像随笔那样很充分地表达作者的所思所虑。随笔不必像论文那样瞻前顾后，却又能把想说的话讲得很透彻。我这里并无在几种体裁之间褒此贬彼之意。我只是想说，在某种特定的时代，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随笔是一种特别适合表达思想的方式。某类思想，某种看法，某些方面的忧虑，当然也很适合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国际问题专家等各种学者以学术论文甚至学术专著的方式加以表达。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这些问题却又往往是“正宗”的学术论文难以问津的。在“正宗”的学术研究领域，这些问题往往是令人忌讳的。高等学校是学者云集的地方，大学教师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在量化管理成为高校基本管理方式的今天，尽可能多地在所谓“核心期刊”发表所谓学术论文，是大学教师的基本追求。既然以发表为终极追求，论文自然要尽可能选择那种“安全”的话题，而那种不够“安全”的问题，那类或多或少“犯忌”的问题，当然不会去碰了。至于今天的所谓科研项目，则更是常常与真问题不相容。是否争取到项目，是否争取到数量既多“层次”又高的项目，是高校评价教师的重要标准。不少学校甚至把项目作为考核、评审的死杠杠。没有争取到某种级别的项目，便不得升副教授；没有争取到更高级别的项目，便不得升教授和当博导。即便当上了博导也不意味着就可马放南山。连续几年没有再争取到某种级别的项目，就会被剥夺继续指导博士生的资格。大家都去争项目，而决定项目能否成立的首要标准，却又并不是学术性的。有某种凌驾于学术之上的铁则，在对申报者的课题进行首轮筛选。这就意味着，项目，在许多时候是回避真思想、真问题、真学问的。学术在项目化，而项目，却又往往是非学术化的。

本来，随笔作为一种表达思想的文体，与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和学术项目，没有必然的联系，相互不必有什么影响。但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和学术项目被纳入某种既定的轨道，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随笔的繁荣。换句话说，本来应该由学术论文、学术专著承担的一部分职能，现在由随笔来承担了。随笔发表、出版的空间，远比学术论文、专著要宽广，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有几种专门发表随笔的刊物，其包容

度是任何一种学术刊物都难以比拟的。当然，并不只有这几家专门的随笔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才值得注意。我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报刊上，读到精彩的随笔文章；甚至那种很冷僻很没有影响的报刊，偶尔也会有文章让我们眼睛一亮。如果我说，这十多年来，在随笔中有着更多的真思想、真问题、真学问，不知是否会招来驳斥。

二

“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海外，这种状况已经存在许久了。在海外、境外，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关于中国“文革”的著作出版。有的是研究性的著作，有的是资料汇编，有的是“文革”亲历者的回忆录。而在中国大陆，“文革”在被许多人遗忘的同时，又在被一部分人怀念。不谈论，不研究，主流的学术界仿佛不知道曾有一场持续十年的“文革”时期，是“文革”被许多人遗忘的根本原因，而这也是“文革”被另一部分人怀念的原因之一。当然，不谈论、不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准确地说，对“文革”否定、批判性地谈论和研究，是十分困难的，而肯定和揶揄性地谈论、研究“文革”则绝无问题。实际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美化“文革”，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文革”中有平等，并且“文革”时期的平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文革”中有民主，并且“文革”时期的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文革”中没有腐败，所以“文革”是反腐防腐的最好方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我毫不怀疑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说“文革”中有自由，并且“文革”时期的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他们可以用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文革”的歌颂，表达他们对毛泽东时代的赞美。他们从西方绕行到东方，从古代迂回到当代，千方百计地证明着“文革”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故作家浩然，在“文革”中是大红人，所以他不同意把“文革”称为“十年浩劫”。但他毕竟同意称“文革”为“十年动乱”。而今天的一些学者，则连“动乱”这样的定性也不认可。他们甚至说，除了“文革”初期有些混乱，此后的七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浩然对“文革”的

感情，虽然令我作呕，但他是“文革”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他对“文革”的感情还不难让人理解。而今天的那些用曲里拐弯的理论赞颂“文革”者，本身也是“文革”的经历者，在“文革”时期是已经懂事、记事的平民子弟。我更不相信他们赞颂“文革”的真诚。我不相信他们表达的真是一种学术观点。我不相信他们的常识缺乏到如此程度。他们缺乏的不是常识，是某种精神的底线。他们的不真诚，却吸引了一批真诚的信奉者。那些对“文革”毫无切身感受的年轻人，那些“文革”后才来到人世的人，读他们的著述，便对“文革”无限神往，以为那真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美好时代。

对这些学者以学术的方式赞颂“文革”，别的学者难以也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反驳。他们可以写一篇数万字的论文，一本数十万字的专著，列举“文革”的种种“好处”，再用那种时髦或不时髦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好处”，以此证明“文革”的“伟大成就”。但你却不能也以数万字的论文或数十万字的专著，列举“文革”的罪恶，并用不合时宜的理论解释这些罪恶，以此证明“文革”是大灾难、大悲剧。也即意味着，你不可能与他们打阵地战。人们常说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界有两种思想派别之争。其实，这种派别之争如果真的存在，也绝对不是一种公平之争，这一“派”与那一“派”的话语空间，是差别极大的。这一“派”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尽情地摆出支撑自己观点的证据，而另一“派”却并不能如此。另一“派”只能隐晦地、曲折地、十分注意分寸地表达异议，这一点，是关注这种争论者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这一点，也是未来的人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学术史、思想史时不能不考虑的。

揭露“文革”罪恶，抗击对“文革”的美化，这一历史使命很大程度上由随笔来承担了。最近十来年，是随笔在坚持着对“文革”的回忆和控诉（小说等虚构性的文本另当别论）。1986年，巴金写了《“文革”博物馆》这篇随笔。巴金呼吁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并且认为对此“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巴金说：“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

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巴金甚至天真地说：“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我之所以说巴金天真，是因为的确有不少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一直沉默着，直到告别这个世界。而也的确有人在把“牛棚”描绘成天堂，在赋予“惨无人道的残杀”以历史合理性。但这十来年间，也有一些随笔作者不忘巴金的呼吁。从维熙的《“古镜”新说》^①就是对巴金的响应。《“古镜”新说》回忆了“反右”，回忆了“文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从维熙述说了自己“文革”中亲眼所见。1966年8月的最后几天，“皇城近郊”的大兴县一个公社，“也将三百多口地、富和地、富子女，一起屠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来到人世38天。笔者当时正在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改造，劳改干部中有一位叫王月娥的干部，其家庭就在这个公社，因其出身不好，就在那三两天内，一家七口人被杀戮了六口，全家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从维熙无限悲哀地说：“巴金老人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来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尽管从上到下都盛赞其言为‘世纪良心’，但时至今日，只见各种博物馆拔地而起——包括民俗、昆曲、皮影等博物馆都兴建起来了；唯独不见纪录十年血色文革的博物馆问世——不要说问世，连‘下雨’之前的‘雷声’，也还没有听到。我们至今还对自照镜子如此畏惧，真是不知其心态是清是浊是黑是白，是爱国还是误国了!”巴金也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但2005年的从维熙，一定知道自己这些话其实显得很天真。不因为这样的话显得天真就不说，这表现了可贵的执著。有时候，天真真是抗击邪

^① 从维熙：《“古镜”新说》，载《随笔》2005年第5期。

恶、戳穿遮蔽的最好方式。

晓剑《抄家的经历》^①，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提到了“文革”博物馆：“有专家分析说，若把北海的淤泥清理一下，从里面筛出来的金银财宝不仅能够支付清理费用，多出来的还够建一座‘文革’博物馆。”这是因为，“文革”期间，抄家之风正盛时，北京那些家里有点金银财宝者，都趁夜深人静，将其扔进了北海。晓剑回忆的是自己参与的抄家。那时候，“红卫兵”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打谁就打谁，想抄谁就抄谁，想怎样抄就怎样抄的。打死了人，逼死了人，也就如同弄死一只蚂蚁。晓剑回忆道：“我所在的人大附中曾经以一举抓获在海淀区声名显赫的流氓集团头目‘四龙一凤’中的‘凤’而名噪一时。现在细想起来，这个‘凤’不过十七八岁，略有姿色，大概就是和龙们睡睡觉，绝没有吸毒、抢劫、拐卖妇女、欺行霸市、开发廊当鸡头之类的勾当，但被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抓到后，一阵拳打脚踢，不知命中了哪个要害部位，便呜呼哀哉，尸体被扔在教学楼的楼梯下。当天夜里，还有一个父亲是挺有名的将军的高三男同学因着对异性的好奇，前去‘研究’了一下她的身体构造，结果被当场擒住，若非他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子女，肯定也会被当成小流氓给处理了。”“红卫兵”打死人，决非稀奇事。晓剑说：“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手下的冤鬼被拉到八宝山去火化，至于有多少人在震惊世界的‘红八月’中被打死，尚没有人进行统计，恐怕这也是个不太容易干的事。据当时八宝山火葬场的工人披露，最多时，一天有两卡车尸体拉进来。”有人不承认这是“浩劫”，那要怎样才算是“浩劫”呢？有人还在为“红卫兵”的行为辩护，那“红卫兵”要把事情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让你们不再为他们辩护呢？“文革”中“红卫兵”的打、砸、抢，绝对应当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红卫兵’言行研究”，是极好的学术项目和学术专著的名目吧，而且，这样的研究应当尽快做，应当趁当年的亲历者健在时广泛获取第一手资料。但这样的项目和专著，现在似乎不可能有。即便仅仅是“文革”中的抄家，也是应当有历史学家进

^① 晓剑：《抄家的经历》，载《亲历历史》，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